第33卷第4期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Vol. 33 No. 4
2017 年 4 月 JOURNAL OF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April 2017

范仲淹音乐思想论略

丁 晔
(陕西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范仲淹在《与唐处士书》中,对“中和之道”的音乐思想有了较为深切的阐释,并对崔遵度“清丽而静,和润而远”的学说赋予新的理解。在《今乐犹古乐赋》中,范仲淹表达了其“与民同乐”的音乐思想,并认为音乐是服务于政治、礼法的,体现了乐与政通的思想。范仲淹的音乐思想始终贯穿于他的诗、词、乐创作中,且他的音乐创作理念是以重视先秦礼乐制度为真谛,这些作品皆是他音乐思想的体现。

关键词:范仲淹;中和;音乐思想
中图分类号:J6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17)04-0106-03

一、引言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后徙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北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诞生于河北成德军(即真定府,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县)节度掌书记官舍[1]1。当时他父亲范墉任成德军节度掌书记。在范仲淹两岁时,其父病故,家道中落,母亲谢氏因家贫而无所依靠,则改嫁于淄州长山朱氏,遂随后父姓朱,名说。大中祥符四年(1011),范仲淹在得知家世后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只身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并师从于戚同文。数年寒窗苦读,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之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据《宋史》载,范仲淹作品有《文集》20卷、《别集》4卷、《尺牍》2卷、《奏议》15卷、《丹阳编》8卷等。司马光在《代韩魏公祭范文正公文》称赞其:“高文奇谋,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者。”[2]1244

二、范仲淹对儒家“中和”音乐思想的继承

作为我国传统乐器代表,被誉为“八音之首”的古琴,曾被历代文人志士视为宝物,弹琴亦是“修身”或“修心”的必修课程。所谓“士无故不撤琴瑟”,因而操琴在文人的日常生活及其相互交往中,渐成风尚。加之宋代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在此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热爱古琴的文人志士,范仲淹就是其中的一位。范仲淹好琴,尤视琴为“正始音”,予以推崇。他自幼潜心苦读儒家经典,其音乐思想深受儒家思想之熏陶,无论作诗或操琴,皆以儒家之道为依归。

在《与唐处士书》中,范仲淹对“中和之道”的音乐思想有了较为深切的阐释。作品约作于天圣七年(1029),范仲淹时年41岁,入朝为秘阁校理,向唐处士学琴,故有此书。他在此书开篇便指出古琴之“道”,即琴人、琴乐与天下治平之“道”相连接,与天地调和一致,这也是宋代文人对古琴之“道”的理解。他认为“颐天地之和,莫先于乐,穷乐之趣,莫近于琴”,意为琴之“中和”源于自然天地之和,因而琴乐与天地相通,亦与人心相通。其意义就在于他将“中和”之道作为琴声、琴乐的审美准则,继而他又对秦之后琴道的散失深感惋惜。文中的“谕德崔公”是指宋仁宗在东宫时之师——崔遵度,被仁宗誉为“尤良师也”。崔遵度是宋初享誉盛名的琴家,他性情疏淡,一生“清静平和,惟与琴会”。他“清丽而静,和润而远”的学说对后世琴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后范仲淹又赋予此学说以新的阐释“清厉而弗静,其人也躁;和润而弗远,其人也佞,弗躁弗佞,其中和之道欤?”[1]214文中的“清厉”“和润”是形容声音的清丽宁静,是对琴声音质清晰明快、音调委婉和谐的要求,讲求音乐外在的美感。

收稿日期:2016-11-15
作者简介:丁晔(1991—),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研究。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琴音之中和温润、贞静宏远便是琴道之内涵。“佞”带有柔媚、谄媚之含义，“静”与“佞”之别在于古淡与妖冶，因而形成鲜明对比。“静”“远”是讲音乐内在的情感，是琴乐意蕴深远的体现，亦是音乐的根本。如此便是要求人们在弹琴时心无杂念，淡泊宁静。因而，与琴音相比，琴意更为深远，更能给人以弦外之音的意境，从而达到无所不至、玄妙莫测的境地。如果琴音不能够达到“清厉”“和润”的话，就有失雅正，使人心变得躁动不安，因而就背离了“中和”之道。所以“清”“和”是雅正的本源，亦是声音的主宰。后来明代兴起的虞山琴派正是继承了崔遵度的学说。后人也多认为徐上瀛《溪山琴况》的音乐美学思想，亦是发展了崔遵度“清丽而静，和润而远”的音乐观。另外，此书还表明了范仲淹推崇儒家所倡导的“正始音”，即琴乐与政治相通，治乐如同治世的思想。他继承了先秦儒家在治国理政方面进行“声音之道与政通”的思想教育观点，即以音乐教育为主要的承载形式，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风气。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宜建大雅”的审美主张，他希望重建雅乐，将琴乐纳入雅乐的轨道，此主张属于雅乐的审美范畴。由此看出，范仲淹的音乐美学思想，源于传统儒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更为深切的阐述。

三、范仲淹对先秦礼乐思想的继承

《今乐犹古乐赋》体现了范仲淹“与民同乐”的音乐思想，提倡继承先人的音乐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以曼妙积极而富有仁德光辉的高雅之乐为主导。他提倡雅乐，反对那些蛊惑人心，庸俗怪诞的郑卫之音，将自己的治世之道运用到治乐当中。强调：“古之乐兮所以化人; 今之乐兮亦以和民。在上下之咸乐，岂今昔之殊伦?”[1]17 他认为好的音乐会使人民和顺安定并与民融洽，表达了乐与政通的思想。此思想正是继承并发展了孟子“与民同乐”的思想，所谓的“今之乐犹古之乐”实际上就是以郑声为代表的“今之乐”犹古之乐。这种观点认为孟子的今乐就是“郑声”，但孟子不崇古非今，对今乐采取的是与对古乐相同的态度。范仲淹认为“今之乐”应结合社会与政治层面来讨论，这样就束缚了君王审美的个人权利。君王的个人审美必须建立在社会政治的和谐和人民百姓的福祉之上，复兴了孟子“与民同乐”的思想。他认为“今乐犹古乐”的基本立足点为今乐和古乐都具备儒家之内涵，这也是范仲淹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说明琴具有与政相通、治平教化的功能。由此可以看出范仲淹极为重视先秦时期的礼乐制度。

不仅如此，“通变”思想亦是范仲淹音乐思想中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只有“变”才能“通”而“久”。可以说，范仲淹在众多宋代文人中就通变问题而言具有深远的意义。范仲淹在此赋中则将“通变”思想表现得十分明显，他认为古乐和今乐也许在形式上会略有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的，即皆具备儒家之特征。一为“化民”，二为“和民”，皆以愉悦团结天下万民为宗旨，亦起到移风易俗之作用，所以他坚定地认为“教胄而何须往古”，“举今古而酌中”。此赋是从雅乐的角度谈论古乐与今乐。儒家思想认为“教化”是音乐的首要功能，并且其音乐思想的出发点是服务于政治、礼法的。就某种角度上来划分，“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和心”“和天地”“和民”。而且将琴作为“和心”的外部载体，在“和天地”中完成了道德伦理、日常伦理、自然伦理的结合，在“和民”中既重视民政亦注重民性。只有与老百姓“共乐钟鼓”，才能使天下“八风时叙”“万舞日新”“播治世之音，无远弗届”“不惑于郑卫，自能和于天地”[1]17。就其本质而言，范仲淹当然没有办法脱离宋初崇尚“雅正”的整体风尚，这一点从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基本政治倾向和人生追求便可得知。在古代，“乐”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体征和标志，“乐”的功能及其效益体现出文人志士“达则兼济”的政治抱负。因此，元好问在《范文正公画像赞》曾给予范仲淹高度评价：“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2]1256 由此观之，人们早已熟知文化之“化人”“和民”的功能，熟知文化之“洽群情”“康兆庶”的效益，更熟知文化之“和气充于天下”与“德华振于域中”的使命。这也是文化发展“万邦共谅”“百世攸同”的追求。说明音乐可以安慰人的心灵，使人精神和谐。

四、范仲淹对古琴之意境的阐释

范仲淹常借琴乐而言志，以此来表达对家国形势或命运的担忧。在《与唐处士书》中，范仲淹表述了其“琴不以艺观”的音乐思想。他反对“妙指美声，巧以相尚，丧其大，矜其细”。他强调演奏古琴时应注重琴曲的意境及个人的内在修养，不能只注重演奏的技巧和音质，以此达到娱己的艺术功能。如果乐曲中没有情感可言，那就无可听之处。他的诗句中亦有许多对琴与琴曲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其不同的音乐思想。自古以来，宋词配合琴乐而歌之事就一直存在。范仲淹平生善长古琴与诗赋，常以诗赋琴，于琴思古。他在主持庆历新政期间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曾写下“思古理鸣琴,声声动金玉。何以报昔人,传此尧舜曲。”[1]32从此诗中亦能深切体会到其强烈的改革意识和忧患意识,由此还能看出琴在古代常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的象征而出现,且琴声最能够平和人心。范仲淹的音乐思想还受到儒家思想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影响。他认为“将治四海先治琴”[1]40,即以“琴”作为“治四海”的辅助工具,最终又与治“道”相通,并直接为政治服务,从而表现出一个心忧天下、爱国爱民的政治家的音乐思想,生动传神地记述了听真上人琴歌的切身感受。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有记“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止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3]310范仲淹抚琴并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琴技,而是以琴志趣,以琴娱心,抒发自己意气昂扬的豪迈之情。据传,《履霜操》为西周时的曲子,距离范仲淹生活的时代已将近 2000 年。“履霜”一语,源自《易·坤》中的“履霜之戒”,谓踏霜而知寒冬将至,以此来警示自己,任何事态发展都有其潜在恶化的可能,必须时时刻刻居安思危,得荣辱,虑于未萌,防患未然。因其总喜欢弹奏《履霜》这首古典乐曲,而又有“范履霜”之说。显然,此雅号最能表达其悲天悯人、爱国恤民的忧患意识。“爱此千年器,如见古人面。欲弹换朱丝,明月当秋汉。我愿宫商弦,相应声无间。自然召南风,莫起孤琴叹。”[1]50范仲淹常与友人交流其音乐之道,以此表达其对音乐的挚爱,同时又体现了范仲淹对家国形势或命运的担忧。“奏以尧舜音,此音天与稀。明月或可闻,顾我亦依依。月有万古光,人有万古心。此心良可歌,凭月为知音。”[1]29此诗作于范仲淹怀才不遇之时,他以琴作为精神的载体,并借明月寄托个人情志。诗人将琴与自然景物紧紧连结在一起,不仅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之情,惜己空有一腔热血而无处施展,而且吸纳了山水之品格,这亦是一种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他还在《和韩布殿丞三首·琴酒》中写道“弦上万古意,樽中千日醇,清心向流水,醉貌发阳春。”[1]69说明悠扬的琴声中可以包含万古深意,一片清雅高洁之心应该向着那高山流水去寻觅知音。由此观之,文人弹琴已不仅是一项单纯的音乐活动或是一种技艺,而是抒发个人情感、表现理想、寄托情思的精神探索和生命体验。范仲淹的音乐之道倡导的是“传此尧舜曲”“奏以尧舜音”。他的“思古”“万古光”“万古心”,指的都是同尧舜一样有德行的圣贤仁人。且文人琴的又一特征是以琴作为修养身心,依凭精神,寄托理想的器具,用来抒发自己超然、旷逸、豪俊之意气。如孤寂之时,望月抚琴,或将自己的志趣寄于大自然的丘壑林泽之中,从而表达出渴望自己的心思能为人所知,知音难遇之感。儒家思想还认为音乐主体决定着音乐之美,唯有具备“中和”的音乐审美观,才能正确欣赏和理解音乐。而这种“中和”的音乐审美主张,正是通过主体在欣赏音乐过程中的自我调节与控制,使音乐主体的思想境界来适应客体的需求,使之和谐、平衡。即弦与指合,指与音合,音与意合。从而达到正确欣赏音乐的至高境界。

五、结论

范仲淹的人生道路极为坎坷,而正是由于这种坎坷才造就其顽强的性格,从而使其艺术作品富有极强的生命力,创作也更具有一定的自由性。他的艺术作品包括音乐、琴棋书画等,融会贯通,形成一体。当我们深入到范仲淹卷佚浩繁的著作中去探索他的人生与音乐世界的时候,会使人深切地感受到范仲淹不仅是位大文豪,一代宗师,更是位极其专业的音乐理论家。总的来说,范仲淹的音乐思想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指引,继承了儒家的音乐审美观,且实属雅乐审美观的范畴。

参考文献:

[1](清)范能浚.范仲淹全集(上)[M].薛正兴,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2](宋)范仲淹全集(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3](宋)陆游.老学庵笔记[M].杨立英,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孙艳秋】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